

月氏種屬問題再研究

陳健文

- 壹、前言
- 貳、對突厥（Turk）說的質疑
- 參、對羌（藏）種說的批判
- 肆、月氏應為印歐語族
- 伍、結論

壹、前言

在月氏民族的研究中，其種屬問題始終懸而未決，然大致說來，以高加索種（即歐羅巴種）說、突厥種說以及羌種說等三種最為有力。（註 1）月氏種屬的確定對於上古中亞地區的種族分佈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倘月氏屬於歐羅巴種，則代表上古時期印歐語族的擴張曾經向東推進到中國的甘肅省，而非僅限於新疆地區；（註 2）另一方面，若月氏為突厥種，那麼則表示在上古時期，突厥人種是甘肅到新疆這片廣大地域上的主體居民；又月氏果屬於羌種的話，則表明了無論是歐羅巴人種或是突厥人種，在上古時期皆未侵入上述的地域，蒙古人種與歐羅巴人種的接觸，可能還要遲至更晚的時期。基於上述的理由，月氏的種屬問題在近百年來，一直是東西方學者們不斷努力的關注焦點。筆者曾在兩年前略為論述過月氏之種屬，初步的結論認為月氏應屬於高加索種，（註 3）然該文中卻缺乏對其他二說進行較詳細的批判，現願藉此文，在前文的基礎上，對此一問題進行更細部的研究。

貳、對突厥說的批判

月氏爲突厥（Turk）種的看法，在月氏種屬的討論中一直是相當有力的一派。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日人白鳥庫吉主張最力，用功最深，西方學者中亦有不少人持相同的看法，進來大陸學者蒲朝絨、戴春陽二氏亦用力甚勤，蒲、戴二人企圖從考古學證據上來論證月氏爲突厥族，爲此說注入了新力，可謂是突厥說的新發展。然經吾人細讀推敲之後，發覺突厥說中可議之處仍夥，現試逐一辨證於下：

一、白鳥氏認爲：古代塔里木盆地中許多城郭諸國的名稱，皆可用突厥語解釋之，足以證明此地上古時期曾爲突厥民族所居。他舉證如疏勒、溫宿、姑墨、伊吾盧等地名皆爲突厥語，故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主體居民，甚至天山以北的塞種（Saka）皆爲突厥種。（註 4）

案：白鳥氏著述之年代，新疆地區的考古工作尙未發達，然近來在大陸考古學工作者們的努力之下，已逐漸展現出成果，特別是體質人類學方面的材料。這些人類學的材料已明白地顯示：古代塔里木盆地早期的主體居民仍以歐洲系人種爲主，蒙古人種並不佔有優勢的地位，目前新疆境內所知最早的人種是青銅器時代的原始歐洲人種類型。（註 5）

而疏勒一詞，雖可用突厥語來解釋，但未嘗不可用印歐語解釋之。如新疆安德爾所出土佉盧文書之中曾出現一買主姓名Suligs，托馬斯（F. Thomas）指爲疏勒人。而粟特在中世波斯語作Sulik，“Suli”即粟特，粟特語 l 與 d 可以交替，赫爾曼認爲疏勒來自粟特。又於疏勒附近所發現的圖木舒克文書中（其所記錄語言爲一種伊朗語），稱該地居民爲Sudani，-ni 爲形容詞尾，da 相當於 la，爲其方言之特點，和粟特語一樣，Suda/Sula 即漢語「疏勒」原音，圖木舒克語可能同於疏勒語。（註 6）可見疏勒一詞究係何種語言及其含意爲何，目前還難以作出結論，（註 7）不過據《大唐西域記》的記載，疏勒人「容貌粗鄙，文身綠睛」，加上其附近之圖木舒克語爲一種伊朗語，故疏勒人可能爲歐羅巴種。（註 8）

至若溫宿國，白鳥氏引伯希和之說認爲：溫宿爲突厥語稱「三」之意。然據《漢書·西域傳》云，其國「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可見其國類於鄯善（即先前之樓蘭）。而樓蘭（鄯善）之人種，經考古發掘之結果顯示，其早期居民以地中海型人種東支爲主。（註 9）該國後來採行佉盧文作爲書寫工具，T. Burrow 氏從樓蘭佉盧文書中發現樓蘭語中含有吐火羅語的底層，（註 10）故樓蘭人先前說的可能是一種吐火羅語方言，林梅村先生更因此認爲樓蘭人是吐火羅

人的一支。(註11)所以從體質和語言來看，早期樓蘭之主體居民無疑是歐洲人種。(註12)溫宿之國情既同於鄯善，其居民極可能亦說一種吐火羅語，且其西面之尉頭國說的是的是一種塞語，(註13)看來溫宿周圍皆為印歐語國家，故其居民疑應為歐羅巴種而非突厥人種。

關於姑墨，白鳥氏認為此地名為突厥語「沙」之意。《大唐西域記》稱其國曰「跋祿迦國」，為梵語Baluka之譯，其義為沙丘。該國與溫宿曾長期役屬於龜茲，據《大唐西域記》記載，其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屈支即龜茲，而龜茲人說的是吐火羅語乙種方言（或稱龜茲語），雖然該國可能因長期役屬龜茲而改說吐火羅語，(註14)但亦不能排除該國原本就是吐火羅語族的可能性。

白鳥氏最後又舉《後漢書·西域傳》中的伊吾盧（即今之哈密）為例，再次論證其出自突厥語。對於哈密地區原始居民的種族，近年來的考古發掘報告可以提供我們一些參考。據哈密地區焉不拉克古墓的發掘研究報告指出，該墓之年代相當於西周到春秋，墓葬分為二期，早期的人種型態中，蒙古人種佔有優勢的地位，到了墓葬晚期，歐洲人種的成份明顯增加，表明了此一時期西方種係居民向此地區的遷居更趨活躍。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的蒙古人種是接近於現代東藏地區組（藏族B組）的綜合特徵，(註15)而非突厥人種，因此該地較早的居民果真為蒙古人種的話，也應是與羌種較有關係，而不是突厥人種。

二、白鳥氏除論證塔里木盆地之原始居民為突厥人種外，烏孫經其細考亦為突厥人種，(註16)而其東鄰歷來共信為突厥人種之匈奴則經其考定為蒙古種，白鳥氏因之論斷素與匈奴劃分的月氏必為突厥種。(註17)

案：依白鳥氏之見，蒙古高原東部為蒙古種之匈奴所盤踞，而其西鄰之烏孫、塞種、以及塔里木盆地之土著民族既皆為突厥種，則處於此一地域之月氏必為突厥種無疑。然誠如前述，塔里木盆地之土著以歐羅巴種民族為主，至於烏孫的人種，無論是前蘇聯或大陸方面的考古資料均顯示：烏孫的體質特徵是以歐洲人種為基礎，而混雜了輕度的蒙古人種。(註18)雖然烏孫存在著“歐洲人種但被突厥化”的這種可能性，(註19)但有更多的學者認為烏孫是一種說印歐語的歐羅巴種民族，有主其為塞種者，(註20)亦有主其為吐火羅語族者；(註21)而塞種目前學界已公認其為一種操伊朗語之歐羅巴種民族。若案白鳥氏之邏輯，既然上述匈奴西部之民族皆為歐羅巴種，則月氏亦為印歐人種無疑。

三、後代乾陀羅之突厥王認為迦膩色迦王為其祖先，Kalhann於其所著Kajataranginil/70稱迦膩色迦王及其朝他帝皆為Turushkas，猶言突厥人也。(註

來政權聲稱自己系出前代聖王之後，進而強化本身政權之正統性者，歷史上亦有跡可循。乾陀羅的突厥王之所以稱迦膩色迦為其祖先，可能是突厥人以貴霜王朝的合法繼承人自居，（註23）猶如南北朝時期，五胡君主莫不聲稱自己擁有華夏血統；（註24）而成吉思汗之後，內亞草原諸酋亦競相宣稱自己為成吉思汗後裔，此類史例斑斑可考，似不足以證明後世之突厥王朝與大月氏貴霜王朝有任何直接的關係。

四、後世所掘出之貴霜錢幣上的大月氏王像，多為高額隆鼻、唇厚多鬚之種型，衣服寬鬆，足靴甚大，為土耳其斯坦境內之普通衣履，貴霜部人謂為屬於突厥族，可不致誤。（註25）案：所謂的突厥人種，其本身已含有濃厚的高加索人種血液，（註26）是故突厥人種亦具高鼻多鬚之貌，因此若欲從人像外貌上來細辨其為突厥人種或高加索人種，顯然有一定程度的困難。至於其服飾，內亞草原民族之著褲與靴，無論是東方的匈奴或西方之斯基泰人（Scythian）皆然，此為草原民族之共同服飾，實不足以作為界定民族種屬之依據。

五、夏德（Hirth）氏謂如匈奴、烏孫、大月氏皆有翁侯之官名，翁字從廣東音讀作yap，故翁侯可讀作yap-hau，與後世突厥之官名「葉護」為同音異譯，（註27）月氏曾在大夏置五翁侯，故月氏為突厥種。

案：翁侯一詞雖可用突厥語來解釋，然未嘗不能用印歐語解釋之。翁侯一詞於貴霜錢幣上之形式為yavuga，蒲立本（E.G.P-ulleyblank）氏認為其源自吐火羅語之“土地、國家”一詞（焉耆語 yapoy，龜茲語 ype）；（註28）而Richard N.Fnye氏則認為翁侯實源自伊朗語之字根yam（其意為掌握、控制），貝利（H.W.Bailey）亦持此說，認為yavuga為yam字根再加上-uka字尾而成，（註29）故此一字彙實源自於伊朗語，而為日後之突厥民族所沿用。

六、1980年代以來，蒲朝絨、戴春陽二氏先後為文，力主甘肅沙井文化即月氏族所遺留之文化遺址。（註30）由於沙井文化含有濃厚的北方草原民族文化色彩，再加上蒲、戴二氏皆認為匈奴為突厥族，故進而推定月氏亦屬於此一突厥系統之民族，他們認為“深目、多鬚髯”是匈奴等突厥種型的顯著特徵，故月氏應為阿爾泰語系之先突厥語族。

案：沙井文化的內涵較為複雜，雖然其表現出濃厚的北方草原文化氣息，但該文化同時亦受到黃河上游地區古文化之影響，如絕不見於鄂爾多斯高原的偏洞室墓制。（註31）由於西北一帶長期以來即為民族雜處之地，而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同質性一向很高，早期在該文化分佈地域活動的民族除月氏之外，尚有戎、羌、匈奴、烏孫等族，是故有人對於該文化的屬性仍持有異議。（註32）再加上

沙井文化尙未見有人骨鑑定資料發表，而這又是討論古文化遺址居民種族相當重要及可靠的材料，利用其他間接材料難免摻雜主觀臆測的成份，（註33）雖然沙井文化有可能是月氏所遺留之文化遺址，但這種看法目前尙未在學界形成定論，故本文擬不再就其文化內涵做進一步的討論。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蒲、戴二人均引用了《史記·大宛列傳》中暗示月氏是「深目、多鬚髯」的記載來加強其月氏爲突厥種之主張。但是該傳中有一項重要的訊息二人卻刻意不提，〈大宛傳〉曰：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

大月氏當時的位置據同傳云是「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是以大月氏人當屬深眼多鬚之類。但除此之外，其語言與周圍之伊朗語系居民是相當接近的，雖有方言性之差異，然大體上仍可溝通。蒲、戴二氏只截取其中容貌部份的記載而刻意忽略大月氏與伊朗語族之間的親密性，此種論證著實難以令人信服；況且他們的論證是建立在匈奴屬於突厥種的基礎上。一如前述，突厥人種本身已具有濃厚的高加索種血緣，但戴氏卻從林幹之說，認爲匈奴人是「藍睛、高鼻、多鬚」的，（註34）如此一來，不知如何從外貌去分辨何爲高加索種，何爲突厥種，而且尙有學者仍持著「匈奴在體質上是接近高加索種」這種看法的。（註35）因此對於蒲、戴二氏在文獻上的論證，我們認爲還有待商榷。

以上爲突厥種說之大要，我們可以看出：突厥說在體質上，並無法與歐羅巴種作出明顯的區分；在語言上，若干突厥的語辭亦可用印歐語來解釋。而所謂的突厥人種亦非是一種明確的體質類型，毋寧是偏重以語言來界定，即凡是說突厥語的，大抵皆可歸類於突厥族。如唐代之黠戛斯（即漢代之堅昆），據《新唐書·回傳》黠戛斯條的記載，其體質特徵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就外貌來說，該族顯爲高加索種無疑，但可能是因爲其族已改說突厥語的緣故，故被歸類爲突厥系統，所以黠戛斯不妨說是一種已經突厥化的歐羅巴種。（註36）我們必須注意突厥族的祖先本身就含有塞人的血統，（註37）做爲其起源地的阿爾泰地區，在中世紀以前一直是歐羅巴人種與蒙古人種的交匯之地，古代的塞人與烏孫在體質上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蒙古人種混血，（註38）此種人種上之交互影響現今已得到考古學上的證實。（註39）因此突厥說雖是一種有力的說法，然其中若干關鍵性的論證，卻時與歐羅巴種說存在著曖昧模糊之處，是故對於月氏爲突厥種的這種說法，我們目前持相當保留的態度。

參、對羌種說的批判

對於月氏種屬的另一種看法是將其視為羌（藏）種。此說為Klaproth氏首倡，其後Ritter、ViviendeSt.Martin、Richt-hofen等氏亦相繼奉尊。（註40）早年此說曾一度風行，然近年來西方學界已多傾向於歐羅巴種說，不過依然有學者持此種看法，（註41）。國內學者中支持羌種說者亦不在少數，究其論據，主要不外下列幾項：

一、《史記·大宛傳》曾提及月氏西遷時，「其餘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又《後漢書·西羌傳》云：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

論者認為：小月氏留於祁連山與羌族同居一地，本身已說明月氏與羌相近，又其語言略與羌同，則更足以說明問題；（註42）如果月氏與西羌沒有族源關係，則已建成強大國家的月氏人，如何會肯退到南山去依靠尚未建成國家的羌族部落呢？（註43）

案：引用《後漢書·西羌傳》記載的學者似乎忽略掉一些更重要的事實。其一，我們知道作為月氏主體的大月氏是選擇往西遷徙的，而留在南山的月氏餘眾是其「羸弱者」，可見小月氏人原先是屬於一些老弱殘病的成員，因為無法負荷遠行之故，只得選擇就近與羌人共處。倘月氏果真與羌人有密切的血緣關係，月氏又何需勞師遠行，西奔陌生的伊犁河流域？又據《後漢書·西羌傳》之記載，羌人的作戰特性是「長在山谷，短於平地」，若按羌人之特性，青康藏高原才應是他們理想的遷居地，但很明顯月氏並未作出這種抉擇。而他們之所以選擇西遷中亞，似乎正暗示了其與歐亞草原間的親密性。（註44）榎一雄氏即認為月氏原來控制的地域並不僅限於河西走廊，在其最強盛之時，蒙古高原、塔里木盆地、天山以北的準噶爾地區，甚至安息以東廣大的中亞地域可能都在其掌控之下；因此月氏的遷徙並非意味著這個民族從一地遷移到另一地，而應視為月氏只是從東方及北方撤出了他們的勢力。留在原地之月氏亦從未要求羌人的保護，他們只是停留在原來曾為其臣民的羌人土地而已。（註45）事實上小月氏並未一直臣服於羌人，其族雖依諸羌居止，並與之共婚，然亦於霍去病取西河地，開湟中時降漢，但該族「雖依附官縣，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鬥，隨勢強弱」（《後漢書·西羌傳》），「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富勇健，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

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後漢書·列傳六鄧訓傳》）。可以窺見其族群因與羌、漢不同，處於一種邊緣的地位，故乃形成其「首施兩端，隨勢強弱」的性格，蓋非此無法維持部族之繼續生存。至於其「被服、飲食、語言略與羌同」的部份，我們應可理解為：自月氏西遷到後漢的兩百餘年間，經過通婚與共居的關係，小月氏在語言與文化上已逐漸走上羌化的道路，然仍只是「略」與羌同而已；小月氏雖保有自己的部落組織，但後來的人們就時而把小月氏和羌看成是一個種族了，如《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中將小月氏種的狼何稱為羌侯，《後漢書》卷五三〈竇融傳〉載：「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註46）我們尚可留意史傳每提及小月氏時，多稱「胡」而不稱羌，至於其語言文化之略與羌同，只是「民族間長期交往，融合作用的結果」。（註47）

二、《三國志·魏書》中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云：

「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婁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遺種蔥苾羌、白馬、黃牛羌，各有豪酋，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

論者認為：魚豢生活的時代，正值大月氏在中亞勢力最顯赫之時，大月氏人與當時中原人交往甚多，所記當最為可信。（註48）案：此段引文一般多斷為「有月氏遺種蔥苾羌、白馬、黃牛羌」，但未嘗不可斷為：「有月氏遺種、蔥苾羌、白馬、黃牛羌」。（註49）其實魚豢所處的三國時代距月氏西遷已歷近四百年，經過了長期的民族融合之後，稱月氏為羌並不足為奇。這支分佈在南山（即今之崑崙山，非甘肅之祁連山）的月氏遺種，疑非月氏西遷經過時所遺留，而是留在該族原先分佈的地域，並未隨之移徙的月氏族。（註50）民族發展的主流一向是民族融合，這條史料告訴我們，此時的小月氏已和羌人互通婚姻，共同生活而交相融合，（註51）所以不能拿此種民族融合發展的結果而將月氏與羌族在族源與種屬間劃上等號；況且根據同為三國時代之萬震所著《南州志》的記載，大月氏國「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從中可看出大月氏國人民當時為白種人無疑，因此萬震的這項記載，可視為是一項對《魏略·西戎傳》的反證。是故要以《魏略·西戎傳》的記載來證明月氏為羌種的這種論證是難以成立的。

三、月氏原屬氏羌系之蒙古人種，遷到中亞之後，生活漸受當地文化的浸染，乃至於人種亦是，因此闖入異域的月氏人也就同後來的匈奴、鮮卑、女真般

地融入其所征服的異民族之中了；（註52）即是說，月氏是西遷之後與中亞當地的印歐土著混血，才長得像白種人。（註53）

案：前文已提及，民族融合是民族發展的主要趨勢，但必須留意的是此種融合的過程並非一蹴可及，能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據《史記·大宛傳》之記錄，大月氏國在張騫的時代是「控弦可一二十萬」的大國，按保守的估計，當時大月氏的人口應在四十萬左右。（註54）雖然大月氏在西遷過程中可能還吸收了一些塞種的部落，但比例應不至於太高，蓋塞種在遭月氏擊敗後，其主要部落已隨塞王南遷蔥嶺以南之罽賓，其中有部份滯留於蔥嶺，另一部份則進入塔里木盆地，而少部份留在原居地的塞人後來併入了烏孫。（註55）至於當時的大夏，《史記·大宛傳》云其人口「可百餘萬」，可見當時並未將被征服的大夏國人口列入大月氏之中。且大月氏西遷到大夏地區後能迅速地成為當地的統治強權，應與其仍保有一定程度的人口有關。大月氏放棄伊犁河流域南擊大夏的時間約在130B.C.左右，而張騫到達大月氏的時間則約在129B.C.，（註56）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一個仍擁有龐大人口的民族，其人種要驟然地從蒙古人種性質的居民變為歐洲人種成份是很困難的。（註57）即使西遷後的大月氏馬上與當地屬於伊朗系之土著混血，那麼其第二代之容貌應是「貌不甚胡，頗類華夏」（《魏書·西域傳》語）才對，但《史記》卻仍將大月氏歸類於深目多鬚一類，可見大月氏在西遷大夏後，並未對當地人種帶來衝擊性的改變。況且張騫兩度西使，沿途所見的種族不少，果月氏為羌種，那麼對於這個當初出使的主要對象，張騫何以未特別說明其與羌人間的關係？又《後漢書·西羌傳》中對羌人之源流與族支均有詳載，但該傳並未特別說明月氏是羌族，對小月氏亦稱其為胡而不稱羌；再說月氏在中亞做為一個統治民族，要在短期內使國內四十萬左右的人口都遷就當地的土著而由羌語改說印歐語，似乎也是不大可能的事。（註58）

因此，對於羌種說的三項主要理由，我們也認為難以成立。

肆、月氏應為印歐語族

月氏之種屬問題雖然相當複雜，然而無論是突厥說或羌種說，依筆者管見均有可議與商榷之處，月氏較為可能的種屬應是歐羅巴人種中的印歐語族。其理由如下：

一、體質上：前引《史記·大宛傳》的記載曾明白顯示，自大宛以西至安息的人種是屬於「深眼多鬚」之類，而大月氏當時的位置正處於大宛之西二、三千

里處，故大月氏之人種應與大宛、安息一樣，是深眼多鬚的歐羅巴人種。此外，萬震《南州志》亦云大月氏「人民赤白色」。案萬震為三國時人，距月氏西遷已近四百年，大月氏可能已和當地土著完全混血。此條史料表明了當時貴霜帝國的人民是歐羅巴種，但這其中必定包含有原來的大月氏人在內，雖然貴霜是否出自大月氏至今仍有疑義，但顯然當時以四十萬眾人口入侵的大月氏，並未改變當地原有之人種特徵，因此「即使不考慮月氏和貴霜同出一源，也不能懷疑月氏人是歐羅巴種」。（註59）

至於月氏族群中是否混有其他的人種成份，筆者曾認為月氏人種中似乎還混有黑膚色的茶羅毗狄亞（**Dravidians**）人種在內，極可能是月氏在進入中國之前，曾與**Dravidian**人種發生過某種程度的混血。（註60）與筆者相近的看法亦見於**C.H. Winter**氏，他認為月氏即吐火羅人，而從吐火羅語中他發現存在著**Dravidian**語的底層，**Winter**氏因而斷定吐火羅人起源於**Dravidian**及曼丁人（**Manding**）；他推測該族後來之所以改說印歐語，是緣自於遭到一支來自歐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征服所致。（註61）吐火羅語中確實有許多不同於其他印歐語的創新，這可能是由於它脫離印歐語共同體比較早，並且長期與其他非印歐語接觸而產生的，吐火羅人與**Dravidian**有過一些接觸也不是不可想像，（註62）但若說吐火羅語起源於**Dravidian**，這種說法目前在語言學上尚未能夠得到證明，甚至是難以成立的。（註63）月氏是一個游牧的部落同盟，其中摻雜了若干其他人種並不為奇，特別是蒙古人種，因為我們不能忽略月氏曾在中國西北活動過的事實，但月氏民族中主要的人種類型應該還是以歐羅巴種為主。

二、語言上：一如前述，包括大月氏在內的大宛以西至安息諸國之語言，雖存在著方言性的差異，但大體上仍是可以溝通的，這證明了月氏與這些民族一樣，說的是一種印歐語，倘若當時月氏說的是突厥語或羌語，不知他們如何與周圍之印歐語系居民達到「相知言」的地步。我們必須留意到：中亞一些綠洲居民所說的語言，同斯基泰（**Scythian**）語是差不多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曾指出，花拉子模人是屬於瑪撒該塔伊人（**Massagetes**）和薩迦人（**Saka**）的一部份，又說索格底亞那人（**Sogdians**）與巴克特里亞人（**Bactrians**）在生活習俗上同游牧人很少區別，他還說明米底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亞人，索格底亞那人等所說的語言都是一樣的，鮮有區別，可見中西史料說法一致。（註64）而麥高文（**W.M. McGovern**）氏亦指出：在整個古代史的大部分中，北土耳其斯坦和南土耳其斯坦的居民本來同屬一種，他們的種族和語言都是密切相聯的。如波斯的征服南土耳其斯坦，並不是一個“種族”屈服於另一個“種族”，是以

波斯對於此一區域的征服，在種族上與語言上都不起重大變化。（註65）同樣的情況，McGovern氏此段的見解似乎亦可應用在大月氏對於大夏（Bactria）地區的征服上。

至於月氏人的原始語言是印歐語系中的伊朗語或吐火羅語，至今尚未有定論。支持伊朗語族說者如勞費爾（Laufer）氏，於1917年在其題為《月氏即印度斯基泰人的語言》的小冊子中，根據漢文文獻記載的一些月氏詞彙，認為月氏語是和斯基泰語、粟特語（Sogdian）、沃塞梯語屬於同一組的北支伊朗語。（註66）貝利（Bailey）氏則根據于闐文書，研究了月氏未遷徙前所留下的詞彙，證明月氏說的是一種伊朗語。（註67）此外，在二次大戰後，法國考古隊在阿富汗北部大月氏貴霜王朝統治中心之一的Surkhkotat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迦膩色迦王碑銘。這是用希臘字母寫成之前所未知的大夏-吐火羅語，屬於伊朗語的一支，（註68）被稱之為「真正的吐火羅語」；但後來另有學者迴避給予此種語言以名稱，而僅稱之為「大夏碑銘」。（註69）雖然學界對於貴霜是否為大月氏所建仍爭議不下，且亦懷疑此種語言可能是該地原有土著的語言，然對伊朗語族說者而言，此次發現不啻為另一項有力的證據。另一派學者則主張月氏說的是吐火羅語，並且其中若干的語彙還曾經影響到中國的語詞；（註70）而美籍印度學者那拉因（A.K.Narain）氏除肯定月氏為吐火羅人之外，還進一步推測中國西北部才是印歐語族真正的起源地。（註71）另外一個證據是敦煌所出的宋人寫本《西天路竟》中，曾將高昌與龜茲國間的國名喚為月氏，因此可以認為焉耆即月氏；（註72）而焉耆一地在中古時期是所謂吐火羅語A種方言（即焉耆語）流行的地區，故所謂吐火羅語實即月氏語。又在回文經題記中，稱吐火羅乙種方言為Kusan語，又稱uguKusan或四Kusan國。眾所皆知，大月氏西遷後建立了貴霜帝國，F.W.K.Muller氏據此認為乙種吐火羅語實為貴霜語，屬於大月氏的一種方言，W.Winter氏對此也有相同的看法；此外，貴霜王名中的後綴-ka，亦應源自於龜茲語。（註73）後來日人羽田亨據回文書考證的結果，證明Kusan實即龜茲。（註74）黃文弼亦認為焉耆、龜茲與月氏音近，或為大月氏西遷時所建立的國家。（註75）支持此說者咸認，在新疆所發現的“所謂吐火羅語”正是焉耆、龜茲二地土著所講的語言（註76），且吐火羅人自稱為Arsi，此即為月氏之名稱。（註77）

在其族稱方面，伊朗語族說者如G.Haloun氏將「月氏」一詞的原型構擬為Zgujaka，從而將月氏與斯基泰人等同起來，（註78）日人榎一雄亦從此說。（註79）又據Strabo氏《地理誌》（Geographica）的記載，滅亡大夏王國（Bactria）

的薩迦四部族分別是Asii、Gasiani、Tochari以及Sacarauli。(註80)有人認為其中的Asii即是月氏；(註81)但亦有人認為Gasiani，才是月氏。(註82)W.B.Henning氏更認為月氏即古代原居於西波斯，後來曾入侵巴比倫的Guti人，他們與其兄弟部族Tukri族，在公元前三千年經過長途跋涉而來到中國，Guti族與Tukri族即是日後月氏與吐火羅人的祖先，他們同時也是最早出現於歷史上的印歐人。(註83)對於月氏的語言是伊朗語或吐火羅語的爭議，目前學界尚未有較一致的看法；較為折衷的說法是將月氏視為一混雜了此二種語族的部落聯盟，Aaii(操伊朗語)為Tochari(即吐火羅語族)之統治階級，(註84)或者認為二者彼此相混，實際上已很難區分。(註85)

三、文化上：月氏人的文化生活在史籍上並不多見，但從少部份的記錄中仍可看出其同北之方草原游牧民族，尤其是塞人特別地接近。《史記·大宛傳》載大月氏之風俗是「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可見月氏與匈奴一樣，同屬內亞地區的騎馬游牧文化圈，而此種文化以古代斯基泰—塞人之生活為代表。(註86)月氏與塞人的文化生活似乎存在著較多的相似性，如《大宛傳》描述大宛以西諸國的風俗是「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我們發現中亞的塞人亦有此俗。塞人的婦女地位是相當高的，他們不僅和男人一起參與社會事務，同時還和男人一起參加戰鬥，並且非常勇敢。像公元前六世紀的Massgetes女王托米麗司，就是在丈夫死後親率軍隊打敗了強大的波斯軍隊，波斯王大流士一世並因而戰歿。(註87)大月氏人疑有此俗，月氏在遭匈奴擊敗後，似曾發生過立夫人為王之事。據《大宛傳》載，當張騫抵達大月氏時，「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但《集解》引徐廣曰：「一云『立其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王」；《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可見月氏可能發生過立夫人為王之事。而月氏西遷後歷百餘歲，至班固著《漢書》時，大月氏的風俗是「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幣與安息同」(《漢書·西域傳》)。此項記載間接地證明了月氏原本就與當地居民有著較接近的語言與風俗，且大月氏在遷到大夏地區後，能很快地降服該區諸多土著居民而建立貴霜帝國，兩者在人種與語言上的一致或接近，無疑是促使月氏與當地居民很快融匯並建立強大帝國的內在因素。(註88)

由上述《漢書》的記載我們可以得知大月氏在遷到中亞地區後，很快地便融入了當地的土著民族之中，然而留在南山與羌人共居的小月氏情況又如何呢？根據《後漢書·西羌傳》的資料，他們雖然已經開始部份羌化，但似乎仍然維持著

大部分原來的種族與文化特徵，並未迅速地與羌人融合成爲一體，以下的事實可提供出一些證明：

其一，〈西羌傳〉中多稱小月氏爲胡而不稱羌。如「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雖然該傳中曾多次出現“羌胡”並提的字眼，其實二者的區別是嚴格的。胡是指活動於北方沙漠草原地區的一些遊牧部落，主要指匈奴、東胡而言；戰國至秦代，活動在甘肅的大月氏也稱胡，新疆一帶的西域諸國，又叫西域胡亦或省稱胡。羌人是畜牧的部落，而畜牧和遊牧是有區別的，畜牧業部落肯定是有某種程度不等的農業，故羌是指和胡人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部落。（註89）至於「胡」字之原意，呂思勉曾云：

「胡之名本專指匈奴，後乃馳爲北族通稱，更後則凡深目高鼻多鬚，形貌與東方人異者，舉以是稱焉。」（註90）

黃文弼先生亦認爲：

「兩漢人多稱西域諸國爲胡，如《漢書·西域傳》云，『西夜與胡異，其種類氏羌行國。』……漢人稱胡皆以其深目多鬚之故，故胡概指容貌言也。……其他蔥嶺以西各國大多數皆斷髮，如康居、安息、月氏……等國，丈夫皆剪髮（俱見《通典》一九三）。是蔥嶺東西諸國民俗皆剪髮，與崑崙山脈諸民族之被髮不同。……根據考古學的研究大月氏人爲隆鼻多鬚之種型，與古籍中所述胡人形貌大抵相同。」（註91）

如黃氏所言，《漢書·西域傳》已注意到胡與氏羌民族在體質上的差異，故亦間接證明了月氏與當時的氏羌等蒙古人種民族在體質上所表現的明顯區別。至於羌人的髮式，據《後漢書·西羌傳》的記載是「被髮覆面」，與月氏之剪髮不同，亦可證羌、胡之異。

其二，從後世對小月氏的部份零星記載，我們亦可看出小月氏依然保有與塞人相同的習性。前文曾述及小月氏並未完全融入羌人的部落，直至後漢時期，他們還一直保持著自己的部落組織，成爲一個弱勢的邊緣族群。小月氏雖在被服、飲食、語言方面略爲羌化，但依然保存了原有的草原民族文化習性。《後漢書·列傳六鄧訓傳》明確地記載著小月氏仍然保存了一些原有的塞種風俗，該傳云：

「（小月氏）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這裡所提及的以刀自割及刺殺牛馬，騎馬歌呼之俗，與塞人因王卒而殘身及殺馬之俗，可說殆無二致。（註92）此俗不僅流行於塞種，古代中國北方的匈奴與春秋時期之晉國似亦沾此俗。（註93）。塞種尚武兇悍之習性常令古代的西方民族不寒而慄，而作為小月氏後代的仲雲族，其獷悍之性，亦猶未完脫，頗類塞種。《新五代史》卷七十四〈四夷附錄〉引高居誨《使于闐記》云：

「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廬磧，云仲雲者，小月氏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州之人皆憚之。」（註94）

小月氏遺種仲雲族之驍悍性格，明顯地繼承了《後漢書》時代小月氏人「皆富勇健」、「常以少制多」的堅強戰鬥力，這大概也是小月氏種人能一直延續至十一世紀才從歷史上消失的主要原因。

經由以上之辨證，以及從體質、語言與文化等三方面考察之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月氏在這三方面均傾向於歐羅巴人種。然而月氏亦非是一個純粹的歐羅巴種民族，不論是其早期從西向東遷徙的過程中，或是在中國西北部活動的時期，均無法避免地會混入一些其他人種的因素，如前文曾提到的Dravidian人種，以及更重要的蒙古人種混血。月氏曾在我國西北活動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而該地域一向是歐洲人種與蒙古人種的交匯接觸地帶，所以在這個地域活動的民族，無論是塞種、月氏、烏孫或匈奴，其外貌必然非只表現出某一特定人種的體質特徵。（註95）月氏可能是一個以高加索種為主體而混入了部份其他人種，特別是蒙古人種之部落聯盟；（註96）但他們說的應是一種印歐語，而且在文化特徵上，月氏也與塞種存在著較多的親密性，雖然目前還難以確定月氏屬於哪一種歐羅巴族，但我們至少可以認為月氏是印歐語族的一支，操伊朗語或吐火羅語。

伍、結論

對於月氏的種屬問題學界迄今雖仍無法獲得定論，但我們在檢視了突厥說與羌種說的一些論證之後，發覺這兩種說法的論證不是顯的薄弱，就是尚有可議之處，均無法予人足夠的說服力。歐羅巴種說之證據雖仍略顯不足，但與前二種學說相較之下，依然是較合理的一種看法。月氏為歐羅巴種的看法已逐漸獲得學界

的承認，其中尤以伊朗語族說爲然，（註97）不過吐火羅語族說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註98）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月氏在體質上並非是純粹的高加索種，其部落成員中必然混有某種程度的蒙古人種或其他人種之血液；但他們的語言應是印歐語，在文化上也與活動在中亞草原的塞種有著較多的親密性。因此，月氏還是應歸類爲印歐語族的一支，屬於歐羅巴種。

註釋

- 註 1 另有大陸的何光岳先生主東夷說，不過此說目前尙未出現附和者，見氏著：〈郁夷、大月氏的來源和遷徙〉，《新疆社會科學》1986年第五期，頁90~100。
- 註 2 目前新疆所發現的幾種古語之中有三種屬於印歐語系，即于闐語、焉耆—龜茲語（即所謂吐火羅語）以及粟特語，參見方狀猷：〈三種古西域語之發現及其考釋〉，《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19年）。
- 註 3 拙文：〈月氏的名稱、族屬以及漢代西陲的黑色人問題〉，《國際簡牘學會會刊》，第一號（1993年），頁111~143。
- 註 4 白鳥庫吉：〈西域史上之新研究（第二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第六卷（東京，岩波書店，昭和45年），頁97~227。譯文見王古魯：〈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長沙，商務印書館，民國29年），頁37~156。
- 註 5 韓康信：〈新疆古代的種族人類學研究和維吾爾族的體質特點〉，《西域研究》1991年第二期，頁1~3。
- 註 6 黃盛璋師：〈塞人南遷屬賓與沿途所建諸國考〉，未刊稿，本文即將刊登於近期之《漢學研究》。
- 註 7 魏良弢：〈關於塔里木盆地古代主體居民的幾個問題〉，《新疆大學學報》1987年第四期，頁13~18。
- 註 8 林梅村：〈疏勒考古九十年〉，《文物天地》1990年第一期，頁23~27，1990年第二期，頁24~28，以及註6黃盛璋師文。
- 註 9 韓康信：〈新疆樓蘭城郊古墓人骨人類學特徵的研究〉，《人類學學報》第五卷第三期（1986年），頁227~242。
- 註10 T. Burrow: "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簡稱 JRAS), 1935, pp.667~675。
- 註11 林梅村：〈開拓絲綢之路的先驅—吐火羅人〉，《文物》1989年第一期，頁72~74。

- 註12 黃盛璋師：〈塔里木盆地東緣的早期居民〉，《西域研究》1992年第一期，頁1~14。
- 註13 黃盛璋師：文同註6。
- 註14 周連寬先生認為姑墨一名既不源於突厥語，亦不源自於吐火羅語，而可能來自於所謂的「原阿爾泰語」。見氏著《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74~76。
- 註15 韓康信：〈新疆焉不拉克古墓人骨種系成份研究〉，《考古學報》1990年第三期，頁371~390。
- 註16 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いての考〉，書同註4，頁1~55。
- 註17 白鳥庫吉：文同註4。
- 註18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年第二期，頁3~23。
- 註19 白鳥庫吉：文同註16。
- 註20 余太山：《塞種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138~141。
- 註21 E. G. Pulleyblank： “The Chinese and Their Neighbors in Pre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Times”，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ed. by David N. Keight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411~466。
- 註22 張星烺：〈大月氏民族最近之研究〉，《禹貢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民國25年），頁19~27。
- 註23 余太山：〈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第三十八輯（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9~28。
- 註24 曹仕邦：〈史稱「五胡源出中國聖王之後」的來源〉，《食貨月刊》第四卷第九期，（民國63年），頁28~31。
- 註25 張星烺：文同註22，頁20、21。
- 註26 角田文衛：〈ユーラシア内陸文化の展望〉，氏編《世界考古學大系第九卷北方ユーラシ・中央アジア》（東京，平凡社，昭和38年），頁8、9；另參見註18韓康信文；以及 Bahaeddin Ogel著，陳慶隆譯：〈匈奴以前之中亞〉《大陸雜誌》第41卷第11期（民國59年），頁1-13。
- 註27 白鳥庫吉：文同註16，頁50。
- 註28 E. G. Pu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JRAS，1966 part 2，pp.9~39。

- 註29 Richard N. Frye : “Some Early Iranian Titles” , *Or-ients* , Vol.15 , 1962 , pp.352~359 . H. W. Bailey : *Indo-Scythian Studies , being Khotanese Texts* , vol.VII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130 . E. G. Pulleyblank : *ibid* , p.28 .
- 註30 蒲朝絨 : 〈甘肅永登榆樹溝的沙井墓葬〉 , 《考古與文物》1981年第四期 , 頁32~36 ; 〈試論沙井文化〉 , 《西北史地》1989年第四期 , 頁1~12 ; 〈永昌三角城與蛤蟆墩沙井文化遺存〉 , 《考古學報》1990年第二期 , 頁205~237 . 戴春陽 : 〈月氏族屬、族源爭議〉 , 《西北史地》1991年第一期 , 頁12~20 .
- 註31 蒲朝絨 : 〈月氏文化〉 , 收錄於張碧波、董國堯主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頁993~1043 .
- 註32 蒲朝絨 : 文同註30〈試論沙井文化〉 , 頁1、11 .
- 註33 戴春陽 : 文同註30〈月氏族屬、族源爭議〉 , 頁18、19 .
- 註34 林幹 : 〈試論匈奴的族源族屬及其與蒙古族的關係〉 , 氏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 中華書局, 1983年) , 頁75~87 .
- 註35 內田吟風 : 〈匈奴の人種体型について〉 , 《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 同朋舎出版, 昭和63年) , 頁1-43~165 . 余太山 : 〈匈奴、Huns同族論質疑〉 , 書同註20 , 頁242~271 .
- 註36 陳慶隆 : 〈堅昆、黠戛斯與布魯特考〉 , 《大陸雜誌》第51卷第五期(民國64年) , 頁1~11 .
- 註37 芮傳明 : 〈阿史那人“史前”居地考〉 , 《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二期 , 頁165~176 . 薛宗正 : 《突厥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年) , 頁45~54 . 余太山 : 書同註20 , 頁140、141 .
- 註38 紀宗安 : 〈塞人對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貢獻〉 , 《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一期 , 頁199~204 , 233 .
- 註39 韓康信、潘其風 : 〈新疆昭蘇土墩墓古人類學材料的研究〉 , 《考古學報》1987年第四期 , 頁503~523 .
- 註40 白鳥庫吉 : 文同註4 , 頁197 ; 王古魯譯本頁130 .
- 註41 加文·漢布里 (Cavin Hambly) 主編 : 《中亞史綱要》(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4年) 之第二章〈遊牧帝國與佛教傳播〉(大衛·比瓦爾執筆) , 頁62 .
- 註42 楊建新 : 《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銀川, 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頁72 . 註43任乃強 : 《羌族源流探索》(重慶, 重慶出版社, 1984年) , 頁72 .
- 註44 拙文 : 同註3 , 頁123 .

- 註45 Kazuo. Enoki : "The Yueh-Shih - Scythians Identity , a Hypothesis"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acts ,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 1957 , Tokyo-Kyoto , To-kyo , 1959 , pp.227~232 。
- 註46 榮新江：〈小月氏考〉，《中亞學刊》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47~62。
- 註47 戴春陽：文同註30，頁20。
- 註48 楊建新：同註42，頁72。
- 註49 筆者曾針對此段引文私下就教於余太山先生，余先生認為該段可以此種斷法來解釋。
- 註50 榎一雄：〈尉遲氏と小月氏〉，末松保和博士古稀紀念會編《古代東アジア史論集》下卷（東京，吉川弘文館，昭和53年），頁389~418；譯文見《民族譯叢》1980年第三期，頁48~54，第四期，頁55~60，（斯英琦、徐文堪譯）。但王國維卻認為月氏是經由西域南道西遷大夏，見其〈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觀堂別集》卷一，收錄於《定本觀堂集林》下冊（臺北，世界書局，民國72年），頁1156~1158。註51榮新江：文同註46，頁54、55。
- 註52 張哲誠：〈中國西域古民族—吐火羅之興衰〉，《中國邊政》第110期（民國79年），頁23~38，56。
- 註53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國》（臺北，三民書局，民國70年），頁158。
- 註54 陳良佐：〈從人口推測大月氏、烏孫故地〉，《大陸雜誌》第37卷第三期（民國57年），頁8~32。
- 註55 《漢書·西域傳》罽賓國條云：「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烏孫國條云：「烏孫國，……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 註56 余太山：書同註20，頁58。
- 註57 韓康信：文同註18，頁12。
- 註58 拙文：同註3，頁122。
- 註59 余太山：書同註20，頁64。
- 註60 拙文：文同註3，頁126~137。
- 註61 Clyde Ahmad Winters : "The Dravidian and Manding Substratum in Tokharian"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簡稱CAJ) , Vol.32Nr.1-2 , 1988 , pp.131~141 。

- 註62 徐文堪：〈關於吐火羅人的起源和遷徙問題〉，*Sino-Platonic Papers*，No.53，1994，pp.1~11。
- 註63 Werner Winter：“On a New Claim Concerning Substratum Influence upon Tocharian”，*CAJ*，Vol.33Nr.1-2，1989，pp.126~132。
- 註64 王治來：《中亞史綱》（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頁27。
- 註65 W. M. Mcgovern：*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39，p.64。中譯本見章巽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73。
- 註66 榮新江：文同註46，頁51。
- 註67 H. W. Bailey：*op.cit*（註28），pp.110~142。
- 註68 黃盛璋師：〈試論所謂“吐火羅語”及其有關的歷史地理和民族問題〉，收錄於西域史論叢編輯組編《西域史論叢》第二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228~268。
- 註69 張廣達、耿世民：〈唆里迷考〉，《歷史研究》1980年第二期，頁147~159。W. B. Henning：“The Bactrian Inscription”，*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簡稱BSOAS），Vol.23 part 1，1960，pp.47~55。
- 註70 徐文堪：〈從一件婆羅迷字帛書談我國古代的印歐語和印歐人〉，收錄於李錚、蔣忠新編《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73~403。
- 註71 A. K. Narain：〈關於原始印歐人的中國起源地問題〉（王輝雲譯），《中國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十期，頁24~26；又“Indo-Europeans in Inner Asia”，*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ed. by Denis Sin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1~176。
- 註72 馮承鈞：〈關於西域語之討論（二）中亞所發現的五種語言與支白安康尉遲五姓之關係〉，《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19年）。黃盛璋師：〈敦煌寫本《西天路竟》歷史地理研究〉，《歷史地理》創刊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228~268。
- 註73 黃盛璋師：文同註68，頁252、268，以及徐文堪：文同註69，頁382。
- 註74 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東洋史研究會，昭和32年），頁538~561。但不論羽田亨或黃盛璋師均不認為此Kusan即貴霜，伯希和亦持同樣的看法，見氏著〈吐火羅語與庫車語〉一文，收錄於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頁64~135。

- 註75 黃文弼：〈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收錄於黃烈編《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74、75。
- 註76 有關“所謂吐火羅語”之發現及其名稱問題，請參考伯希和、烈維等著，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同註74），以及季羨林：《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民國82年）。
- 註77 張星娘：文同註22，頁19。然王靜如認為arsi實乃焉耆本地自稱之名，雖與月氏音近，但二者無關，其論證可參考Wang Ching-ju（王靜如）：“Arsiand Yen-ch’ i焉耆，Tokhriand Yueh-shih月氏”，*Monumenta Serica*（華裔學志），*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Vol. IX, 1944, pp.81~91；氏著〈重論arsi, argi與焉耆，焉耆〉，《史學集刊》第五期（民國36年），頁147~158；氏著〈論吐火羅及吐火羅語〉，《中德學誌》第五卷第一、二合期（民國32年），頁217~277。
- 註78 徐文堪：文同註70，頁381。
- 註79 榎一雄：文同註45。
- 註80 Strabo: *The Geography of Strabo*, Vol. V, trans by H. L. Jon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261。
- 註81 Otto. Maenchen-Helefen: “The Yueh-Chih Problem Reexamined”,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65, 1945, pp.71~81。但榎一雄認為此說充滿矛盾，並未解決舊有的問題，見榎氏對該文之書評，刊於《史學雜誌》第59編第八號（1950年），頁95~101。
- 註82 余太山：書同註20，頁2。
- 註83 W. B. Henning: 〈歷史上最初始的印歐人〉（徐文堪譯），《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二期，頁23~34。
- 註84 O. Maenchen- Helefen: 文同註79。
- 註85 徐文堪：文同註70，頁380。
- 註86 莫任南：〈古代歐亞草原游牧民的風俗與文化〉，《史學月刊》1994年第三期，頁80~86。
- 註87 蘇北海：〈古代塞種在新疆哈薩克草原的活動〉，《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一期，頁184~198。
- 註88 戴春陽：〈古瓜州考辨〉，《西北史地》1989年第一期，頁40~51。
- 註89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探討〉，收錄於氏著《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80~192。

- 註90 呂思勉：〈胡考〉，收錄於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同註34），頁37～53。
- 註91 黃文弼：〈漢西域諸國之分佈及種族問題〉，書同註74，頁32、33。
- 註92 莫任南：文同註85，頁82、83。
- 註93 楊希枚：〈論北海 耳地望和月氏匈奴晉人 面之俗〉，《大陸雜誌》第38卷第一期（民國58年），頁7～10。
- 註94 仲雲族爲小月氏種的說法，請參見黃盛璋師：〈敦煌文書中“南山”與仲雲〉，《西北民族研究》1989年第一期，頁4～12，16；以及榮新江：文同註46，頁59。
- 註95 韓康信：文同註18。
- 註96 V.I.Sarianidi：（加藤九祚譯）《シルクロードの黄金遺姁》（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頁251。
- 註97 岩村忍：《世界の歴史.12中央アジアの遊牧民族》（東京，講談社，1977年），頁108。
- 註98 最近林梅村先生發現漢語之「祁連」與「昆崙」二詞，實源自吐火羅語之早期形式“kilyom”。《史記·大宛傳》曾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以往學界一直認爲「祁連」一詞來自阿爾泰語（此說最新的研究代表請參見政大劉義棠教授之〈祁連天山考辨〉一文，文中對「祁連」爲阿爾泰語說進行了相當精闢詳盡的考證，刊於《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一期，民國83年，頁1～52。），此一發現爲吐火羅人曾在河西走廊活動過的事實提供出相當有力的證據，可視爲「月氏即吐火羅人」說近年來最重要的進展，見氏著〈祁連與昆崙〉，《敦煌研究》1994年第四期，頁113～116。